

高等教育信息

2026 年第 4 期（高教信息总 61 期）

发展规划处（质量评估处、高教研究所）编

2026 年 4 月 30 日

● 教育资讯

教育部：高校要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

教育部：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

2026年高考招生新增38种本科专业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现场交流推进会召开

● 高教聚焦

屈凌波：分类改革背景下，以“双优”导向推动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

阎光才：如何理解优质本科扩容

管培俊：师范教育并未进入“减量时代”

● “十五五”规划专栏

严纯华：以教育之变应答时代之问

姜治莹：锚定“十五五”新征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葛道凯：深刻揭示当代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夯基铺路

【教育资讯】

教育部：高校要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

教育部3月31日举行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6年部署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要持续开发丰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资源和工具，赋能学生学习，助力个性化成长与学习。立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全息、全域、全员、全时的沉浸式思政育人模式，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有效路径。

怀进鹏介绍，高校要根据产业结构智能升级，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服务智能经济发展，开设好人工智能交叉融合课程，培养复合型交叉人才。职业教育要联合行业企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更新迭代课程体系，共建实习、实训、实践基地，有针对性地培养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兴岗位高技能人才。

（来源：央视新闻 2026年4月1日）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部署要求，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统筹谋划基础环境和创新生态建设，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

《行动计划》提出推进“十五五”期间“人工智能+教育”四大重点任务。

一是推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素养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确保开齐开足开好人工智能课程，着力培养学生智能思维；高等教育阶段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体系；职业教育阶段推动传统产业相关专业的智能转型，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技能人才；终身教育阶段汇聚开发优质教育资源，确保全体学习者享有平等学习人工智能的机会；同时，全面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充分激发其应用人工智能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的内生动力。

二是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赋能学生学习，推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满足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和全纳包容；赋能教师教学，推动构建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全环节的智能应用；赋能学校治理，实现便捷服务、精准管理、科学决策；赋能科学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

三是建强“人工智能+教育”基础环境。构筑智能教育基座，建设国家教育智能算力服务平台(教育智联网)，提供高质量算力支撑、数据服务、模型能力和智能体工具；培育应用生态，共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众创生态；建立智能应用能力评估体系，遴选优质成熟智能应用；建设未来教育空间，打造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实训中心。

四是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开放生态。深化研究创新，推动多学科交叉，构建“政产学研金”协同机制，培育高质量教育智能产品；强化条件保障，构建契合人工智能发展的教育政策制度体系；拓展国际合作，推动优质公共产品和中国标准“走出去”；筑牢安全屏障，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

《行动计划》强调，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人工智能+教育”全过程，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谋划、指导监督和条件保障。教育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工业和信息化、数据管理等部门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工作，各地各校要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应用示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及时总结宣传优秀经验做法。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年4月10日)

教育部：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行动计划提到，培育面向智能时代的高层次人才。

推动人工智能成为高校公共基础课，按学科专业分类编写课程教材，推动全体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知识。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特点，打造“短实新”的前沿创新课程。

优化传统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交叉融合课程，丰富跨学科、跨专业课程群，培养复合型交叉人才。

根据产业结构智能升级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学科专业。

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等力量，深化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探索人工智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来源：教育在线 2026年4月10日)

2026年高考招生新增38种本科专业

教育部4月28日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

2026年批准列入目录的新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1	低空经济与管理
2	资源环境审计
3	数字金融
4	数字贸易
5	森林消防
6	政治安全保卫
7	太极拳
8	语言科学
9	法律英语
10	计算语言学
11	语言智能
12	智能计算
13	心理、脑与认知科学
14	真空工程与技术
15	能源科学与工程
16	半导体工艺与装备
17	城市更新
18	稀土科学与工程
19	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
20	交通能源融合工程
21	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
22	农业机器人
23	智慧景观营造
24	生物制造
25	低空安全管理
26	盐碱地科学与工程
27	智慧渔业
28	核医学工程
29	商业人工智能
30	数字公共治理
31	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
32	数字文旅
33	乐器智造
34	艺术治疗
35	具身智能
36	脑机科学与技术
37	工程互联网
38	深地科学与工程

(来源：央视新闻 2026年4月28日)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现场交流推进会召开

4月22日，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现场交流推进会在江苏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围绕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座谈会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卓越工程师

培养改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主持会议。江苏省副省长赵岩出席会议。

怀进鹏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卓越工程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以来，我们坚持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作为改革的重要依托，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改革的根本指引，新型举国协同机制初步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的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不断完善，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能力标准与核心课程体系，推动以创新成果为导向的评价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特别是发布了全球首个聚焦工程硕博士教育的行业标准，在深化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培养堵点的同时，持续扩大我国在全球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怀进鹏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交汇点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必须以更宽视野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一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紧扣“十五五”产业重点方向，围绕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以超前部署抢占战略主动权，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结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要推动培养改革向更广、更深拓展，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建强核心课程、实践平台、校企课题、双导师队伍等关键培养要素，以人工智能赋能工程教育创新，推动培养范式从知识传授向智慧创造跃升；打通机制建设、评价改革的堵点难点，优化学科布局与供需适配，带动高等教育整体变革。三要坚持开放创新，积极拓展卓越工程师培养国际合作，向全球工程教育界分享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理念与实践经验，持续提升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中国石油集团专家代表，教育部研究生司、教育质量评估中心负责人，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有关负责同志作专题报告。江苏省教育厅、清华大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作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江苏省有关部门，以及有关高校、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6年4月22日）

【高教聚焦】

屈凌波：分类改革背景下，以“双优”导向 推动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随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启动实施，应用型高校如何找准类型定位、提升办学能力、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成为高等教育分类改革中的重要议题。近日，由中国现代产业学院协同创新平台主办的“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与产业学院院长论坛”在杭州举行。会上，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高校研究分会理事长屈凌波教授就当前分类改革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如何找准定位、突破困境、提升服务区域能力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1. 分类发展成为高校改革的必答题

问：2026年，“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按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您如何理解这一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屈凌波：分类发展不是高等教育的“可选项”，而是普及化阶段的“必答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46万人，毛入学率达60%。在规模扩张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后，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已从“有没有学上”，转向“上什么学、培养什么能力”。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发展受“分层”逻辑影响较深，“千校一面”“有类无型”“夹心层困境”等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高校仍存在向“研究型”目标靠拢的惯性，学科设置、培养模式趋同；应用型高校数量众多，却常常被置于同一套评价体系之下，博士点、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奖励等指标在资源配置和社会评价中权重较高，导致其类型优势难以充分体现，也容易出现“创新水平比不上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特色又不如职业院校鲜明”的尴尬。

所以，分类改革的核心，是推动高等教育从“分层发展”走向“分类发展”，从“单一赛道竞争”转向“多元功能协同”。研究型高校承担“从0到1”的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聚焦“从1到N”的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技能型高校深耕产业落地与工匠培养。三者不是高低之分，而是功能互补、链条衔接。唯有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才能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完备人才梯队。

2. “双优”工程回应应用型高校夹心层困境

问：您提到应用型高校长期存在“夹心层困境”。在“双一流”建设面向研究型高校、“双高计划”面向职业院校的背景下，“双优”工程对应用型高校意味着什么？

屈凌波：应用型高校数量众多，是高等教育体系中连接知识、技术、产业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这类高校的定位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用研究型大学的指标来衡量，没有博士点、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奖项，就容易被认为“不够强”；另一方面，如果只看岗位技能训练，又容易被拿来与职业院校比较，似乎“不够实”。于是，应用型高校就处在一种尴尬位置：科研创新比不过研究型大学，技能落地又不如职业院校直接。

“双优”工程的提出，正是要为应用型高校建立一条更加清晰的发展赛道。所谓“双优”，核心是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它不是简单增加一个评选项目，而是补齐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的关键一环——研究型高校有“双一流”建设体系引领，职业院校有“双高计划”统筹推进，应用型高校同样需要一套与自身类型定位完全匹配的发展框架、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双优”工程最大的价值，在于引导应用型高校不再简单追逐研究型大学的指标，而是回到自身使命：是否真正服务区域产业，是否培养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否推动科技成果和智力资源在地方转化，是否成为区域发展的创新引擎和人才支撑。应用型高校的优秀，不应体现在与研究型大学争同一套排名，而应体现在服务地方、对接产业、支撑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

3. 办学优质与服务优秀同向发力

问：“双优”工程强调“办学能力优质”和“服务区域优秀”。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避免变成两套分散指标？

屈凌波：“双优”不是两个孤立目标，而是一个整体。办学能力优质，是服务区域优秀的基础；服务区域优秀，又是办学能力优质的体现。应用型高校不能只在校内谈办学质量，也不能把服务地方理解成简单做几个项目、签几份协议，而要把办学质量和区域贡献真正绑定起来。

从办学能力看，应用型高校首先要有扎实的学科专业基础，专业设置要紧扣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地方发展需求；要有突出的实践育人能力，把企业生产场景、技术需求、岗位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和训练任务；还要有稳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让教师既懂教育规律，也懂产业逻辑。具体而言，实训课程占比不低于30%，“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40%，横向科研经费年均增长率应达15%以上，年培训人次不低于在校生规模的1.5倍——这些不是附加项，而是应用型办学的底线要求。同时，数字化转型、教学保障体系、质量监测机制，也都应成为应用型高校

提升办学能力的重要支撑。

从服务区域看，关键要回答三个问题：培养的人才是否真正服务区域？科研成果是否真正在地方转化？学校的智力资源是否真正赋能地方决策和产业升级？如果一个地方高校培养的学生能够留在本地、服务产业、成长为区域发展的骨干；如果教师的科研选题来自企业和地方真实问题；如果学校的专业群能够与地方产业链形成稳定互动，那么这种服务就不是口号，而是发展能力。所以，“双优一体”的核心逻辑，就是引导应用型高校在服务区域中提升办学水平，又以高质量办学反哺区域发展。高校和地方不再是松散合作关系，而是校地命运共同体。

4. 产业学院是“双优”落地的关键载体

问：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是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放在“双优”工程框架下，产业学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屈凌波：现代产业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习基地，也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订单班，更不是挂一块牌子的合作平台。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连接起来，成为应用型高校推进“双优”工程的重要组织载体。

过去一些校企合作比较容易停留在点状合作上，比如一次实习、一次讲座、一个项目。这样的合作有意义，但如果不能进入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评价机制，就很难真正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产业学院要解决的，正是从“单点合作”走向“系统共建”的问题。

从运行机制看，产业学院应面向一个行业或一个区域产业生态，而不只是服务某一家企业。它可以通过政府、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形成多方共建、资源共享、需求聚合的平台机制。行业企业不能只是提供实习岗位，而要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项目设计、教学实施和质量评价。

更重要的是，产业学院要让学生进入真实任务。课程不再只是知识传授单元，而要转化为问题解决单元；学生不再只是听课者，而应成为任务执行者、方案提出者和项目参与者。只有在真实场景中，学生才能真正生成场景感知、跨界融合与行动输出的复合能力。对应用型高校而言，产业学院建得好不好，关键不是看牌子响不响，而是看它是否真正重构了课程体系、师资队伍、项目实践与区域服务之间的深度联动关系，是否真正成为“双优”工程落地的实体化支撑。

5. 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需求逻辑

问：您多次强调，应用型高校要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需求逻辑”。这个转变具体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屈凌波：从“学科逻辑”转向“产业需求逻辑”，绝非否定学科建设、放弃学

科根基，而是打破学科体系“自我循环、封闭运转”的惯性。应用型高校当然要牢牢守住本科教育必备的系统知识基础与严谨学术规范，但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建设都必须放到真实产业场景中重新校准、系统重构。

从专业建设看，关键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应用型高校要改变“有什么教师就办什么专业”的惯性，更多从区域产业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岗位需求出发，优化专业布局。对就业质量不高、与产业需求脱节的专业，要及时预警、压缩或停招；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等新兴领域，要加快布局新方向和交叉模块。合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的探索说明，应用型高校的专业群不能建在书斋里，而要真正建在产业链上。

从课程体系看，要从“知识点排列”转向“任务群重构”。应用型高校的课程改革，不能只是增加案例或更新教材，而要把行业标准、技术流程、岗位能力和真实项目嵌入教学过程，形成“理论+前沿技术+实践”的一体化课程体系。活页式教材、项目化教材、微专业、微课程等，都可以成为课程重构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把产业现场转化为育人现场，把企业任务转化为课程任务。

从师资队伍看，教师转型是关键。应用型高校教师不能只停留在讲授知识层面，还要能够进入企业、理解产业、参与项目、解决问题。未来，“双师型”教师占比、企业实践经历、横向课题参与度、项目教学能力，都应成为师资评价的重要内容。只有教师真正懂产业，课堂才可能真正连着现场，学生才可能在真实问题中形成应用能力。

当然，不同专业领域对接产业需求的落地路径各有差异。工科类现代产业学院更多体现在联合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改进、创新成果转化；文科类现代产业学院则可以在文化IP转译、优质内容生产、区域品牌重构、数字传播运营、用户价值挖掘等领域，形成不可替代的特色优势。

归根结底，应用型高校转向产业需求逻辑，不是简单追热点、换名称、增方向，而是要重构专业、课程、教师和评价之间的关系。只有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围着任务建，教师深入现场成长，学生在真实项目中锤炼能力，应用型高校才能真正把办学优势，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现实能力，真正实现“双优”发展目标。

6. 面向新质生产力重塑应用型高校价值

问：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未来最需要把握什么方向？“双优”工程又将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

屈凌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催生大量新产业、新场景、新岗位。它既需要基础研究中的原始创新，也需要大量能够把技术应用到具体场景、把创新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高校恰恰处在这个关键连接点上。

未来应用型高校要把握三件事。首先是定位要清。不能把自己办成研究型大学的缩小版，也不能简单变成职业技能训练机构，而要在应用型赛道上形成差异化特色。其次是融合要深。高校不能关起门来办学，必须把课堂打开，把企业引进来，把学生带到真实场景中，把产业需求转化为教育资源。再次是质量要实。应用型高校的质量，不应只看论文和项目，更要看学生能力是否提升、毕业生是否适配岗位、专业是否支撑地方产业、科研成果是否能够转化、学校是否对区域发展产生实质贡献。

“双优”工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推动一批应用型高校提质增效，而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让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在不同赛道上形成各自标准，也让不同禀赋的学生能够在适合自己的教育中获得成长。

屈凌波教授最后表示，教育强国的根基，深植于广袤的地方土壤之中。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双优”工程是一场深刻的办学转型。只有真正扎根地方、服务产业，把人才培养嵌入区域发展，把产业需求转化为课程改革，把学生成长连接地方未来，应用型高校才能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不可替代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屈凌波：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郑州大学教授】

（来源：教育在线 2026年4月28日）

阎光才：如何理解优质本科扩容

“十五五”期间，优质本科扩容作为实现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但是，如何理解优质本科扩容，对此坊间尚存不少争议。通常，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其理解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以及招生规模的扩容，显然，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有必要澄清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优质本科扩容绝非是作为研究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简单外延式扩张，而是覆盖研究型、应用型与技能型不同类别高等教育资源的全面优化；第二，优质本科的扩容，严格而言，并不仅仅是规划的目的与结果，而是一个撬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结构优化与整体质量提升的过程机制。

“十五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规模依旧持续扩张但更需要关注类型结构优化的阶段。优质本科扩容的目的，不仅在于以数量的扩增满足人民对更好教育的旺盛需求，而且还在于以品质的内涵建设为学生多样化与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为国家战略实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在保证规模适度增长与办学条件持续完善的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立足当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前端和未来

产业涌现的前景，注重学科与专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平台建设和学术水准的卓越，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应用型高校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开发与应用人才培养的重镇，也是服务区域产业改造与升级和全面振兴地方经济的主体力量。因此，更需要通过加大国家扶持和地方投入的力度，促成一大批特色鲜明和服务地方贡献卓越的本科高校崛起；技能型高校以能工巧匠——把新的知识、理论、技术、工具和方法转化为工艺与产品的多面手为培养目标，它同样是社会各领域与产业人才培养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因此，推动部分本科高校向技能型高校转型、提升部分优秀高职院校办学层次，从而建设一批优质职业本科高校群，这也应是“十五五”期间实现优质本科扩容目标的重要构成部分。

总之，“十五五”期间的优质本科扩容，既是目标更是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不是“穿鞋”，即刻意对不同类型高校以及同一类型内部不同机构的寻求自主发展予以规范和约束，更不是“戴帽”，也就是以特定标识或标签凸显身份与地位差异，因而再次重演“异体同构”和“新瓶装旧酒”的历史脚本。对于本轮的“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有必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予以澄清，赋予“优质”多元的内涵界定，以“扩容”覆盖面的拓展，重构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与创新机制，撬动与牵引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轨道上追求卓越，并促发不同机构独辟蹊径形成自身个性与特色，最终达到激活整个高等教育发展活力和全面优化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结构的理想状态。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来源：教育在线 2026年4月1日）

管培俊：师范教育并未进入“减量时代”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振兴教师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进入一个新的“窗口期”。有智库预言“师范教育进入‘减量时代’”，这种推论为时过早。20年前就有所谓专家不断预测“教师过剩”，盖因脱离教育实际，从线性思维、单纯数据、表面现象出发。如果教育决策与社会舆论基于这样的信息，教师教育“十五五”规划的决策就难免战略失误，必要的教师培养规模与师范院校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本就存在的教师资源“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进一步加剧，教师资源有效配置与优化就会支持乏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关于“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优化各级各类学校师生配比，统筹做好寄宿制学校、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配

备”的要求就难以落地见效。

毋庸置疑，人口趋势与学龄人口结构将深刻影响教育的方方面面。新生儿人口下降导致学龄人口减少，确实会直接影响教师的需求与供给，师范教育系统也将产生连锁反应。但影响教师教育的因素十分复杂，全面把握、准确研判教师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对于师范院校确定培养规模、调整人才培养方向与模式，对于加强与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因此，确定教师教育发展战略需要系统思维，需要科学研判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以全面、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教师需求与供给，充分考虑相关复杂因素。不仅要看“减量”因素，还要看到“增量”因素；不仅要看“当前”因素，还要看到“未来”因素；不仅要看“更加公平”的因素，还要看到“更高质量”的因素；不仅要看“规模数量”的因素，还要看到“结构性”与“质量水平”的因素，方能得出完整准确的结论。

首先，预测教师需求和培养规模，要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教师的需求供给随学龄人口规模变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学龄人口变化是递进式的，国家人口激励政策可预期效应显现也有一个过程。分析我国学龄人口结构与变化趋势，受生育率持续下降影响，全国学龄人口规模预期的确相应缩减。同时要看到，各学段人口规模的峰谷呈梯次转移。生育政策调整后还会形成新的入学高峰，并随学制层级梯次传导，学龄人口变化在学段间呈现“波峰迁移”：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递进式变化。而且，学龄人口变化在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因人口流入，适龄人口降幅相对较小，而一些地区降幅相对较大。教师培养与供给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好规划，师范生的培养不能像乘过山车一样“大上大下”。

其次，预测教师需求和培养规模，要统筹考虑中小学班额与生师比等复杂因素。大班额与高生师比是制约教育质量水平的瓶颈因素，提升教育质量必须努力降低班额与生师比。多年来各级政府的努力与成效有目共睹，但一些地方大班额现象仍然存在。尽管适龄人口减少，2024年全国中小学大班额数量却同比增加，意外反弹。初中教育面临入学高峰排浪式冲击，大班额问题比较突出；高中教育普及面临资源压力，学位持续紧张，生师比有所扩大。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结构性问题和城镇寄宿制学校大班额，以及教师负荷过大等问题同时存在。教师资源配置必须同时满足教育的规模需求与提升教育质量的需求，也随学龄人口变化呈现周期性。一般来说，在学龄人口高峰教师要有序增加，不能盲目增编进人；进入学龄人口低谷，缩小班额、降低生师比有了条件与可能，教师要有一定的储备并加大教师进修培训力度。办教育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与教师队伍建设规律，在大班额仍然存在和生师比仍然较高情况下，慎言“教师超编”和“师范教育减量”。

再次，预测教师的需求和培养规模，还要考虑“提升教师学历水平计划”与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师学历与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代课人员比例过高等结构性问题亟待从根本上解决，吸纳更多高学历、高素质教师也越来越具备现实条件，教师的培养规模与质量水平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最后，预测教师的需求和培养规模，还要考虑技术环境的因素。不断有人说，教育信息化可以弥补教师编制不足，AI时代许多教师将被机器所取代。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人机协同的教育，人工智能淘汰的不是人，而是不会人机协同的人。也正如朱永新教授所说，人工智能不会淘汰教师，被淘汰的将是不会用人工智能的教师。不会教书的教师可能失业，而育人的教师永远稀缺。在教育领域，技术永远不能取代人。

总之，按线性思维、静态观点，人口趋势好像导致教师教育当下面临“紧缩期”。而从系统思维和动态的观点看，学龄人口减少的趋势意味着学额紧张逐步趋缓，恰恰是教师资源紧张缓解、优化教学组织、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利契机，即“窗口期”。我们要抓住学龄人口变化的“窗口期”，不失时机地推进小班化改革，降低班额与生师比、改善教育教学基本条件；抓住学术劳动力与教师人才市场变化的“窗口期”，进行教师队伍的结构性调整，努力提高教师培养层次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深化教师人事改革，严格教师职业准入，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编不补”与“无编可补”的困境，而不是南辕北辙，压减教师编制，进一步紧缩教师资源配置。我国本科师范毕业生每年50多万、专科30多万。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人数近1500万，仅按自然减员补充3%，每年至少需要补充近50万；落实教师五年进修一次的规定，至少需要增加10%的进修编制。而降低班额、改善教师配比，意味着需要增加更多教师资源。此外，还要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师资需求。今后报考教师资格证书，必须修学教师教育理论与实操课程。基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与教师供求关系的分析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师范教育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改革创新、调整优化，提高培养层次、提升质量水平，而不是简单一句“减量”萎缩了之。

也许有人仍然会说，这太理想化了，难以做到。的确，在学龄人口持续高涨阶段，由于资源有限，我们只能容忍或允许一定的弹性，但在学龄人口逐步趋减情况下，实现小班化、降低生师比具备了现实可能性。这一目标可以实现，也必须实现，因为这正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

【管培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教师报 2026年4月16日）

【“十五五”规划专栏】

严纯华：以教育之变应答时代之问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解决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

一、就业之困：当“适配”遭遇“时差”

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取向，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人员近饱和的现实，农村、基层及企业难以满足的需求，特别是AI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的内容、掌握的知识与综合能力，与AI驱动下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较长的“转型适配期”。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一种结构性矛盾——“想去的地方不要我，要我的地方不想去”，学生在求职中的迷惘与焦虑日益加深。

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正在通过高质量发展、拓展岗位、优化创业环境等多渠道发力。除了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善，我们必须在“人”的维度上做更深的文章。正确的择业观、高尚的理想情怀，这里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帮助学生完成“就业理想与现实需求、机关与基层、城市与乡村”之间“适配”的关键支撑。我们常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同样重要的是，要鼓励青年学子把青春安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既是就业之策，也是育人之本。

二、学科之变：在“演化”与“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学科的拓展、专业的整合、课程的融合、教法的变革，是当前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传统的知识体系遵循着演化、分化、精化、深化的内在逻辑，这是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今天，未来能源、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快速发展，正以一种“目标驱动”的方式，倒逼我们重新组织教学内容。

关键在于平衡好“知识演化”与“需求能力”的关系。不能因为强调问题导向，就否定了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也不能固守传统学科边界，对产业变革与社会需求视而不见。我们需要的是“有组织地教学”——既尊重教师的学术自主，又将国家和学校的教育意志转化为师生自觉创新的动力。这样的改革必有阵痛，它要求教师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要求学生有突破传统知识摄取路径的自觉，这是一场“课程革命”。但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三、评价之难：切不可“一刀切”

科研评价是指挥棒，牵一发而动全身。我的观点很明确：评价体系必须尊重学

科差异，切不可“一刀切”。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遵循着不同的规律，理应适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应当鼓励基础学科的研究者去全球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平台发表具有创新性、启发性和引领力的成果。我将其概括为“成果上架”。而应用性强的学科，则要聚焦解决关键技术、产品、工艺和流程问题，让“成果上货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的科研不同于科研院所。除了科技创新的职责，还承担着通过高水平科研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使命。这是高校之所以为高校的根本所在。评价一位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不能只看论文、只看奖项，还要看他通过科研带出了怎样的学生，这是隐性却至关重要的价值。

四、育人之本：在“成人”中实现全面发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党的教育方针的一贯要求。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我将其理解为：德为基、智为能、体为要、美为和、劳为勤。

“德为基”，是指品德是做人的根基。“智为能”，强调知识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学生走向社会的核心能力。“体为要”，健康的身心是一切可能的前提。“美为和”，审美教育关乎心灵的丰盈与和谐。“劳为勤”，劳动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脚踏实地的品格。

说到底，教育要回归“成人”的本质。在AI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技术越发达，我们越要警惕人的“异化”，越要强调人的完整性。知识学习与创新能力、个人综合能力，必须双轮驱动、双翼加速，不可偏废。

五、格局之远：培养具有全球领导力的一代新人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图伟业，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全球影响力，更要有全球领导力。

这种领导力从哪里来？首先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涵养出包容、温润、自信的品格。同时，要善于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科技、服务和管理的智慧。只有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只有在文明互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才能真正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中国范式”，传递“中国影响”。

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具有开放的胸怀和前瞻的视野。让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理解世界的多元，在比较中坚定文化的自信，在合作中学会共处与引领。让邻皆友、引敌向和，这不仅是外交的智慧，也应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追求。

【严纯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博雅教授】

姜治莹：锚定“十五五”新征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夯基垒台、全面发力的攻坚之年。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第一篇“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章“主要目标”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明确了我们努力的方向。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新时代新征程，教育战线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核心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支撑作用，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一、筑牢人才培养主阵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职责，最能彰显一所学校的价值和贡献，必须把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结合起来。一是培育心怀“国之大事”的时代新人。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当前形势和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确保培养的学生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二是强化人才供给精准支撑。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千万级毕业生的人才资源优势，联动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就业与产业发展协同政策，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现代产业体系、市场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同频适配，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三是完善人才引育管用机制。既着力培育本土人才，又广开渠道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打破人才流动壁垒，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生态。

二、建设创新突破策源地，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高校要立足学科专业优势，主动融入产业发展大局，推动高等教育的人才优势、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持续优化基础科学研究。对基础研究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二是重点聚焦前沿科技布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人才集聚、学科交叉的优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三是不断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围绕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闭环。鼓励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加速应用研究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育人。

三、打造教育改革示范地，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改革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改革，破除制约三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全局观念，加强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从注重学科自身建设向主动服务国家使命转变，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一是分类推进高校特色发展。推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找准定位、特色发展，精准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突破人才培养评价壁垒。持续深化破“五唯”改革，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育人用人导向。三是推动数字化赋能教育科研。持续建设并深化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以人工智能全方位、全过程赋能高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打造教育综合改革新赛道，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十五五”开局之年，使命在肩、机遇在前。高等教育战线要坚定不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改革的思路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激发发展活力，不断优化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奋力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姜治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葛道凯：深刻揭示当代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夯基铺路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十五五”规划的部署，是国家基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的科学决断，更是对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科学把握与时代使命的精准定位。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以学术使命为引领，以时代责任为担当，深刻揭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一、国际视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势的结构性分析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平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并存，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教育主权意识觉醒，各国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发达国家通过“教育主权”意识强化本土特色，发展中国家则在借鉴中探索自主发展路径。我国高等教育既要注重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也要善于汲取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独特智慧；既要注重从他人的成果经验中受到启发，也要善于从挫折困难中得到警示。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范式革命。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重构高等教育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传统知识传授模式，高等教育从“以教为中心”加速向“以学为

中心”转型，数字素养日益成为师生的重要核心能力。这一变革不仅涉及技术工具的更新，更触及教育本质的深层变革。

社会责任的中心位移。国家战略引领与教育自身发展紧密依存，高等教育社会责任日益从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中心。这一趋势要求高校加快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阶段特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与转型逻辑

普及化阶段的结构性矛盾。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从发展进程看，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数据显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本专科招生数占适龄升学人口的比例超过98%，其中本科超过47%；研究生招生数占适龄升学人口的比例接近10%。然而，区域布局不均衡、类型层次单一化、产教融合不深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空间维度上教育资源呈现“东密西疏”格局，类型维度上应用型高校、应用型学科专业发展不充分，职业教育发展未能受到足够重视，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发展逻辑的范式转换。从改革逻辑看，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从标准化培养转向个性化成长，从封闭办学转向开放融合的驱动力量持续积累。教育质量与政府希望、百姓期盼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要求必须加快结构调整、质量提升、体制创新的步伐。“提质扩容”不能是简单的数量叠加，应更加强调质量与规模的辩证统一，扩容要重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增强韧性；提质的重心则应是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提升贡献，把统筹管理教育科技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三、总体面貌：当代教育对象的代际变迁

数字时代原住民的学习范式。当代高校学生是平视世界的一代，是“数字原住民”。从认知特征看，他们信息获取多元、思维活跃敏捷，但深度思考、系统思维的锻炼相对薄弱；习惯于碎片化学习，投入经典理论和底层逻辑的精力相对偏少。根源在于算法推荐强化了信息茧房，碎片化阅读弱化了系统思维，即时满足机制消解了深度学习的耐心。变革必须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训练”开始，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强化问题导向、探究式学习、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并重等。

自主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张力。从价值特征看，当代学生自主意识强烈、个性表达鲜明，家国情怀深厚，但面对复杂社会思潮时价值辨析的基本功需要锤炼；追求意义感和获得感，对形式主义、空洞说教具有天然的抵触。多元价值选择日趋鲜明。教育供给必须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强化价值引领，更加注重从“讲道理”转向“讲故事”，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切入”，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与说服

力。

技术依赖与社交能力的失衡。从行为特征看，当代学生善于运用技术工具，网络社交活跃，但面对面深度交往、团队协作中的冲突解决本领存在不足；职业选择多元化，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心理韧性亟待提升。教育供给方式必须变革，通过项目式学习、团队协作任务等，强化实体课堂互动性与沉浸感成为必然；挫折教育、生命教育等更是不可或缺。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每一位会员来说，揭示当代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既是学术使命，也是时代责任。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准世界大势、立足中国实际、面向未来需要，深究细琢规划要求，为稳步实现目标任务的结构化有效落实夯基铺路，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会力量。

【葛道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委、教卫体委员会主任、分党组书记】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4期）